

南 洋 公 学 — 交 通 大 学

年 谱

(1896—1949)

霍有光 顾利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 霍有光,顾利民编. —西
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 - 224 - 06210 - 3

.南... . 霍... 顾... .西安交通大学 -
年谱 .G649.2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954 号

书 名: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 (1896—1949)
作 者: 霍有光 顾利民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6 开本 37 印张 22 插页
字 数: 86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书 号: ISBN 7 - 224 - 06210 - 3 G·1057
定 价: 86.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电话:7205196)

目

录

1895 年——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	(1)
1896 年——丙申年(光绪二十二年)	(1)
1897 年——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	(2)
1898 年——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	(7)
1899 年——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	(10)
1900 年——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	(13)
1901 年——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	(14)
1902 年——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	(18)
1903 年——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	(20)
1904 年——甲辰年(光绪三十年)	(22)
1905 年——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	(23)
1906 年——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	(25)
1907 年——丁未年(光绪三十三年)	(29)
1908 年——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	(31)
1909 年——己酉年(宣统元年)	(32)
1910 年——庚戌年(宣统二年)	(34)
1911 年——辛亥年(宣统三年)	(36)
1912 年——壬子年(民国元年)	(44)
1913 年——癸丑年(民国二年)	(46)
1914 年——甲寅年(民国三年)	(50)
1915 年——乙卯年(民国四年)	(51)
1916 年——丙辰年(民国五年)	(60)
1917 年——丁巳年(民国六年)	(65)
1918 年——戊午年(民国七年)	(83)
1919 年——己未年(民国八年)	(89)
1920 年——庚申年(民国九年)	(100)
1921 年——辛酉年(民国十年)	(105)
1922 年——壬戌年(民国十一年)	(116)

1923 年——癸亥年(民国十二年).....	(128)
1924 年——甲子年(民国十三年).....	(137)
1925 年——乙丑年(民国十四年).....	(150)
1926 年——丙寅年(民国十五年).....	(162)
1927 年——丁卯年(民国十六年).....	(181)
1928 年——戊辰年(民国十七年).....	(189)
1929 年——己巳年(民国十八年).....	(203)
1930 年——庚午年(民国十九年).....	(220)
1931 年——辛未年(民国二十年).....	(250)
1932 年——壬申年(民国二十一年).....	(281)
1933 年——癸酉年(民国二十二年).....	(312)
1934 年——甲戌年(民国二十三年).....	(338)
1935 年——乙亥年(民国二十四年).....	(377)
1936 年——丙子年(民国二十五年).....	(402)
1937 年——丁丑年(民国二十六年).....	(441)
1938 年——戊寅年(民国二十七年).....	(463)
1939 年——己卯年(民国二十八年).....	(466)
1940 年——庚辰年(民国二十九年).....	(472)
1941 年——辛巳年(民国三十年).....	(475)
1942 年——壬午年(民国三十一年).....	(478)
1943 年——癸未年(民国三十二年).....	(481)
1944 年——甲申年(民国三十三年).....	(488)
1945 年——乙酉年(民国三十四年).....	(494)
1946 年——丙戌年(民国三十五年).....	(497)
1947 年——丁亥年(民国三十六年).....	(503)
1948 年——戊子年(民国三十七年).....	(519)
1949 年——己丑年.....	(546)
参考文献.....	(555)

序

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它悠久的办学历史,都有它长期以来积淀的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对于这种珍贵的独具个性的文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会自觉地通过种种视角加以开发与整理,尽量向世人展示与宣传,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办学声誉。

交大迄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办学历史。在这 100 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学校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即晚清、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百余年的校龄对一所名牌学校而言,尚属年轻;但人生苦短,新老交替,今人对交大的往事已愈来愈缺乏了解,尤其是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学校的发展历程恍如隔世,因而也愈来愈需要饮水思源,研究校史,继承优良传统,缅怀先师前贤。

历史不应该忘却!正如常言所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里,谨先概略回望一下清代至民国期间,本校大约 54 年的发展历程。

翻开中国近代史,交大前身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国内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1895 年初,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日本帝国主义把耻辱的《马关条约》强加于中国,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我国一大批志士仁人痛感亡国灭种的危机,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倡导广设学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科学(工业)救国与兴学育才的坎坷征途。自此,本校的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在漫长的办学道路上成为我国不断开拓新式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人才,推进中国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先锋。

1895 年 8 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杏荪)率先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并擘画尽快形成南北呼应之势。1896 年 3 月,盛宣怀经奏准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立即捐购建校基地,经费则来自招商、电报两局拨款。南洋公学创办伊始,当年中国之大上海,既缺乏能够接受新式中高等教育的现成生源,又缺少可从事新式教育的现成师资,故不得不先从举办师范教育与小学教育入手。1897 年 4 月 8 日,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批 40 名学生正式开学,附设外院学堂(相当实验小学)则首批招生 120 名。同年颁布《南洋公学章程》,何嗣(梅生)先生任公学总理,延请美国传教士波士顿大学毕业生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博士任公学监院,并负责规划设计

上院(相当大学)与中院(相当中学)。1898年春,中院开学,设译书院,始派留学生赴日本深造。1900年,上院开学。1901年,鉴于国家急需经济人才,设经济特科,延请蔡元培先生为主任教员,并开设政治特科与改设高等小学堂。中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其中4人被选派赴英国留学。张元济(菊生)任总理不久便卸职,尔后本校数易总理或监督。1903年,添设高等商务科,高等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1904年,中院改称高等预科,本校改隶商部。1905年,本校易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设商务专科与铁路专科,本校复改隶邮传部,易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商务科第一届学生毕业。唐文治(蔚芝)先生到校任监督,苦心经营,整顿校务,学校日益发展。1908年,设国文科与电机专科(三年制)。1909年,设航海科,中院及高等预科改为中学,铁路科第一届学生毕业。1910年设西文科。1911年,电机科第一届学生毕业。辛亥革命爆发,本校学生组织义勇军,积极响应上海起义。

辛亥革命后,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师生不仅致力学问,而且也更加关心国事。1912年,本校归交通部直辖,改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铁路专科为土木专科、电机专科为电气机械专科。1915年,土木专科、电气机械专科由三年制改为四年制本科。1916年,添设四年制铁路管理科,初具大学规模。1919年“五四”运动中,进步师生高举“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大旗,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1920年,铁路管理科第一届学生毕业,唐文治校长因病辞职。

1921年,本校与唐山工专、北京邮电学院等合并,成立交通大学。交通部任命叶恭绰(誉虎)先生为校长,任命张铸(剑心)先生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主任、凌鸿勋(竹铭)先生为副主任。翌年,定四月八日“为交通大学成立纪念日”。三校又分立,本校改称交通部南洋大学,此后数易校长。1924年,本校归国留学生凌鸿勋先生受交通部之命为南洋大学校长,提出改良教务、增进为学生课外服务等方针。1925年,本科毕业生第一次授予学士学位。“五卅”惨案中,本校学生陈虞钦烈士被英国巡捕枪杀。1926年,创办工业研究所,本科第一次招收女学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接收本校,改校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科改称交通管理科。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子民)先生兼任本校校长,为适应国家急缺专门人才的需要,将原来的三个专科,分别扩充为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与交通管理学院。同年11月,本校改隶铁道部,以沪校(上海本部)为总校,唐、平二校为分校,易名铁道部交通大学。同时改任铁道部部长孙科(哲生)先生兼任本校校长。1929年,改交通管理学院为铁道管理学院,重建土木工程学院。1930年,原工业研究所扩

建并更名为交通大学研究所,下设材料、机械、电气、物理、化学、社会经济、交通、实业经济、统计、管理、编译等组。设立科学学院,下设数理化三系。同年10月,改任原副校长黎照寰(曜生)先生为校长。1931年,铁道管理学院改称管理学院。自此,五院一所,齐头并进,优势互补,步入稳固发展的时期。继承和弘扬了“求实学”、“务实业”的优良学风,使学校逐渐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1935年,交大同学声援“一二·九”救亡运动,驾火车进南京请愿,要求当局接受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1936年,全校师生发起援绥运动,节食捐款支援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交大人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顽强斗争。1937年8月,本校划归教育部管辖,改名国立交通大学,将原电机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降格为三个系。原科学院改为理学院,管理学院则停办。11月,日军占领上海,徐家汇校舍为日寇强占,本校迁入法国租界,借震旦大学与中华学艺社部分房屋,继续办学。1939年,重庆校友致函,请母校内迁。1940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交大重庆分校(渝校),暂借重庆小龙坎无线电制造厂部分房屋办学,同时在九龙坡建立校舍。建电机与机械二系,以校友徐名材(伯隽)先生为分校主任。1941年,改由吴保丰(嘉谷)先生任重庆分校主任。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不久沪校强被汪伪政权接收,在法国租界坚持办学的大部分师生纷纷内迁渝校。1942年,教育部令渝校为国立交通大学本部,任命吴保丰为代理校长,设土木、电机、机械、航空、管理五系,九龙坡校舍建成。1943年,渝校增设造船、运输管理、财务管理、工业管理四系及轮船、驾驶两专科,筹建工科(电信)研究所。1944年,工科研究所首次招收研究生10名。1945年,渝校在校学生已达1340人,添办电信管理系与电信专科,而轮机与航海两个专修科改为系(四年制)。抗日战争胜利后,自1945年9月下旬起,本校开始陆续分期分批复员到上海。1946年5月复员工作胜利完成,渝校1240余名学生回到上海,沪校800余名学生亦全部集中,共同汇合于徐家汇交大校园。渝校(重庆本部)之历史宣告结束,恢复校名为国立交通大学,重建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航空工程系、造船工程系、工业管理系、电信专修科、轮机专修科、航海专修科以及化学工程系、水利工程系、纺织工程系),理学院(下设数理化三系),管理学院(下设运输管理系、财务管理系、电信管理系、航业管理系)三院体制。12月,教育部下令停办轮机、航海两科,引起全校师生愤慨,自发成立护校委员会。1947年5月,2800余学生自驾火车、自修铁路,赴南京请愿,获得胜利,将轮机、航海两科扩大为轮机工程系与航海管理系。1948年,增设电信管理与电

信技术两个专修科。从学校复员至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激化了国内矛盾。交大学生蔑视疯狂镇压,先后参加与发起了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挽救教育危机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抗议九龙暴行运动、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运动、反对学校驻扎国民党军队运动等政治斗争。学校校长也数易其人,吴保丰辞职后,程孝刚(叔时)、黎照寰(未到任)、王之卓等先生先后任交大校长。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日薄西山。4月,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同学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支有1000多同学参加的地下人民保安队,师生一道巡逻护校,穆汉祥、史霄雯同学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5月27日,解放军完全解放上海。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任命唐守愚为军代表接管交大,组成以吴有训、陈石英先生为正副主任的19人校务委员会,交通大学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交大人历来非常珍视校史,渴望将校史作为一种资源加以整理与开发,渴望交大的优良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可以说,期待系统地整理、编纂校史,是几代交大人的梦。譬如:1932年12月3日,交大图书馆馆长、我国近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交大三日刊》第223期刊登《启事》呼吁,愿以图书馆名义出面,征集和收藏本校历年各种照片、书报年刊、出版品以及“一切有关校史之记载物品”,计划“特辟专室陈列,以资观摩”而垂永久”。1937年7月,唐懋先生在《交大校友》上发表题为《交通大学应从速编纂校史之拟议》的文章,呼吁尽快编纂校史,并提出了两种编写体例:一是“纪事”体,即“记载本校三院之沿革及历年大事之本末。应照《通鉴》方式逐年详述之”;二是“传叙”体,即“记载各优秀校友之传叙,已故者传其生平,健在者叙其劳绩”。唐懋先生在为什么要“从速编纂校史”时强调指出:“凡一国家,一民族,或宗教团体之所以能永存不敝者,非徒其组织完,制度善,及团结性富也,盖其前哲之盛德鸿业,光辉炳耀,足以令后人景仰,而其过去之板荡流离,兴衰治乱诸事迹,亦多可泣可歌,发人弔缅前尘之情,斯其爱护本国本族之心乃益著,故国有史,家有谱,一切民族宗教,莫不各有其生存递嬗之记录。”母校建立已数十年,其间三院之分合,名称之更易,已历数次,所被内争之影响,敌骑之蹂躏,风雨飘摇,生命之不绝如缕者,亦数数见矣……惟兹人事沧桑,驹光易逝,前此一切经过及离合悲欢诸陈迹之依稀仅存于一班前辈老校友之脑海中者,或将因新陈代谢之趋势以渐次淹没,而后人之欲瞻仰前徽,溯怀遗烈者,亦将茫茫然莫知其所自,不亦大可惜乎。惜之,则‘交大校史’之编纂,固不可须臾缓也。”

交通大学(南洋公学)在解放前长达54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

文献,尽管遭受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浩劫,但仍有部分文献得以幸存,成为海内外之孤本。就这笔幸存的文化财富而言,国内鲜有几所大学能够与交通大学比肩。值得一提的是,在这54年里,交大为中国历史舞台不仅培养了像邹恩润(韬奋)、蔡锷(良寅、松坡)、陆定一、黄炎培、邵力子、江泽民、丁关根等一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以及培养了诸如过探先、鲍国宝、胡刚复、朱物华、钱学森、吴文俊、张光斗、张德庆、李文采、褚应璜、丁舜年、钱钟韩、罗培霖、张煦、张钟俊、杨嘉墀、曹建猷、胡聿贤、许学彦、孙钧、汪耕、刘良湛、支秉渊、王安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而且涌现出像唐文治、蔡元培、叶恭绰、黎照寰、吴保丰、凌鸿勋、胡仁源、胡敦复、王之卓等一批教育家,并为我国文化界造就出诸如沈心工、陈源、杜定友、张星、宦乡、唐庆增、弘一法师、许国璋等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师资队伍则凝聚了国内堪称一流的众多学者与专家。不言而喻,交通大学前期(1896—1949)发展史,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不管谁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与教育思想史,都不能无视交通大学前期举办高等教育取得的辉煌成绩。尽管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已启动了校史的整理与编纂工作,出版了《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二卷)、《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唐文治教育文选》等书籍,但只是初步勾勒了学校发展的历史轮廓,汇集了部分的校史资料,其开发与研究程度还远远不够,如学校“历年大事之本末”、“各优秀校友之传叙”,甚至曾经有哪些人在交大工作过、学习过、讲学过、访问过,等等,都一时未能顾及。

随着岁月远去,加之能够接触珍贵校史文献的机会并非人人易得,今人若研究交大历史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及教育思想史,都会切身感受到一时很难探源当年的历史素材与时代背景。从横切面考察,往往难以弄清事件或人物与前后左右的关系及联系;从纵切面考察,往往难以弄清事件或人物发展与变化的历程;以至于,往往觉得不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需要的研究资料。假如有一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896—1949)》(简称《年谱》),按年月顺序汇集各种校史信息,展现学校“历年大事之本末”,展现学校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人物与事件,展现学校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而作的种种努力与贡献,无疑对研究校史及研究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将带来十分的便利。

笔者有见于此,尝试将目前所能看到的1896年至1949年以来有关交大校史之文献,通过钩稽考证、整理编次,按年月日顺序如实摘要叙述,便于人们了解历史脉搏、时代背景、学校沿革与学校传统,弄清具体事件与前后左右的关系与联

系,追踪交大人物的业绩与去向,窥视学科设置与科研动态,考察社团活动与校友情怀,从而认识交大的地位与作用。虽名“年谱”,却刻意略中求详,尤注重五点:一是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情况。力求汇编曾在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师生员工之姓名与事迹,以供研究者追索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是学科建设与创造知识、发展文化概况。一所高等学府除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外,还在于它能为社会创新知识与文化,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徐钟淮先生在本校建校30周年征文集《十载南洋随感》一文中指出:“一校之出版物,最能代表一校之精神。”故《年谱》尽量搜集交大各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题目及作者,以便窥测交大学人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之贡献,亦能方便研究者按图索骥,循迹查找;三是对外交往。举凡中外学术交流、专家莅校演讲、兄弟院校往来等,无不精心网罗;四是学校管理与教育思想。刻意反映各种校规校章与有价值的教育言论;五是南洋精神与南洋传统。尽量编采交大人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各种事迹,以及历届校友对母校的关心与情谊。

系统地整理校史文献,编辑《年谱》,不仅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思想与南洋(交大)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一代代交大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开展素质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校园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能够抢救与保护校史资料,为更多的人接触与研究我校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机会,为国内外学者、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二次(或再次)开发、利用我校高等工程教育文献资源,认识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教育思想史与科学文化史,提供一个史料共享的窗口。

总之,编纂《年谱》,目的是前瞻往昔,后启来者。限于文献佚缺与个人水平,沧海遗珠及考证失误,在所难免,敬祈专家批评指正。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得力于学校“行动计划”的鼎力资助和王文生书记、李玉华副书记、于德弘副校长给予的大力支持,学工部部长白学龙先生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竹守章、张海潮编审也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此外,校内外专家李钟善、梁克荫、刘少林、贺伯清、林毓碛、刘露茜、张发荣等先生在文稿评审时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校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胡栋朝先生在本校30周年校庆征文集的《跋》中指出:“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中不过为吾校研究工业之初期,即在中国工业此时亦仅可谓萌芽之始,后此继长增高,迨二世、三世以至百年,吾国工业当放一异彩,吾校学术亦将与欧美抗。”经过20世纪几代交大人的不

断艰苦创业,我校已奠定了与欧美大学比肩的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办学经验,逐步形成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办学传统,造就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与管理干部队伍,如今已迈入第4个30年。尤其是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并后,组成新的西安交通大学,实现了优势互补,增强了综合实力。全校师生上下一心,正在弘扬交大人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前人的夙愿即将成为现实,新一代交大人一定能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在21世纪前期,把西安交通大学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霍有光 顾利民

2000年4月6日初稿

2001年12月15日修订

学校历任校长简历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甲午战争后,他认为欲图自强,当以培育人才,筹设学堂为先,以兴学堂为己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天津海关道时,盛宣怀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规定头等学堂应修习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成为中国新式大学设置的雏形。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赞助钟天纬在上海设立三等公学,同年11月他奏陈自强大计,分练兵、理财、育才三事,并请设立达成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分设四院,其中师范院即师范学堂,是中国师范学校最早者之一。其余外院、中院、上院则相当于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各习四年,三级衔接,依次递升。此三级学制对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起了一定作用。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在编辑教本,大量选译和介绍各国政治、经济、法律、历史著作方面,也作出一定贡献。总之,在他担任公学督办八年多的时间里,对学校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盛宣怀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曾应童试,补县学生,以后屡试不第。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不断受提拔。李鸿章失势后,转而投靠袁世凯、张之洞等权贵,亦官亦商,历任招商局会办,电报局总办,津海关道,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累官至邮传部尚书。曾倾注毕生精力从事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成为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在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巨大历史推动作用,在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民用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后,主持创办的企业、学校有: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国内第一条南北干线芦汉铁路、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以及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华盛纺织总厂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并因此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返回后,任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董事。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逝。著作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等。

何嗣 (1843—1901),字梅生,江苏武进人,曾任候补知府。清光绪二十二(1896)年同乡盛宣怀为创办南洋公学,亲至何嗣家,讲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

邀请何出面主持办学。他欣然担任公学第一任总理(即校长),一面在上海徐家汇购地、建房,一面暂借民房招生,主持了公学第一期师范班(中国第一个新学师范班)的开学工作。他主持公学四年有余,先后制订了《南洋公学高等小学章程》、《南洋公学章程》、《学生奖励办法及名单》等办学规条,招收各类学生 300 多名,派出留学生十余名。经过精心经营,使南洋公学发展初具规模。清光绪二十七年(1891)年三月一日,何嗣 为两江总督草拟有关新政计划时,不幸病逝于办公室案头。盛宣怀为表彰何嗣 的功绩,特奏请清政府为他在国史馆立传纪念。著作有《存悔斋文稿》。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应盛宣怀之邀,进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工作约三年,期间因公学总理何嗣 病故于任上,遂应聘为公学代总理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约半年。后因与公学洋监院福开森意见不合而辞去总理职务,专管译书院工作。

张元济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旋即离京到沪,任职南洋公学,主持出版严复译《原富》等一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1902 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出版事业,以学者兼出版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尊丰碑。

1902 年初,张元济邀请热心推广新式教育的著名科学家杜亚泉编定蒙童教科书《文学初阶》第一、二卷于当年 6 月出版。该教材知识的广度和通俗性,为当时新式课本所仅见,颇得社会好评。同时,张元济还延请夏曾 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为第一部章节体通史。据统计,辛亥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各种课本 375 种。张元济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可谓功不可没。

从 1916 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善本,如《涵芬楼秘籍》、《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这些书籍的影印完全由张元济主持,其用力之勤,非一般人想象得到。特别是《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其版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审,印刷之精美,都是前所未有的,一直是后世出版业的典范之作。

张元济 1959 年病逝。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和《涉园序跋集录》等。

劳乃宣(1843—1921),字秀 ,号玉初,又号渠斋,晚号韧叟,浙江桐乡人,生长于河北。同治进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出任南洋公学监督,为期不到半年,任内开办了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和公学政治班,促成了大部分中院学生赴国

外留学。曾协助德国人尉礼贤将《论语》译成德文。

清光绪五年(1879)起,劳乃宣先后任南皮、完县、吴桥等县知县,杭州求是书院监院士院,浙江大学堂监督,江宁提学使。光绪三十四年(1898)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宣统二年(1910)任资政院议员、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作《正续共和解》,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以清朝遗老自居。曾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寓住上海。

劳乃宣是著名的音韵学家。长期从事古代数学研究,对汉语拼音文字的提倡与推广,作出一定的贡献。通等韵字母之学,撰有《等韵一得》。主张推行简字拼音,曾奏请设立简字学堂于南京。因王照所制《官话字母》只限京音,不能推行于南方,乃增订成为《宁音谱》、《吴音谱》等,主张令人先习方音简字,再习京音简字,使方音逐渐统一于京音。民国二年(1913)“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时,多采其说。1921年病逝于青岛。

著作有《各国约章汇录》、《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民主君主平议》、《遗安录》、《古筹考释》、《合声简字谱》、《筹算浅释》、《韧叟自订年谱》、《桐乡劳先生遗书》等。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清光绪二十八年(1892)七月,盛宣怀聘他担任南洋公学总理。他上任后致力于校务整顿与师资的安排,主张中西文并重,办好特班。

1898年沈曾植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礼聘,任武昌两湖书院讲席。1906年任安徽布政、护理巡抚。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1917年曾参与张勋复辟,授学部尚书。

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鬻医篇》、《秋斋杂诗八首》等,被清朝遗老推崇为“硕学通儒”。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

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西北舆地考》、《岛夷志略考证》、《元秘史笺注》、《汉律辑补》、《海日楼诗集》、《海日楼文集》、《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菌阁琐谈》、《辛丑札丛》等。

汪凤藻(1851—1918),字云章,号芝房,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毕业于同

文馆。清光绪二十八年春,被盛宣怀任命为南洋公学总理。汪凤藻与前几任总理不同,平时所作所为均引起校内师生的不满。同年11月,因导致“墨水瓶事件”而自行离职。

甲午战争期间任清政府驻日公使。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务长、格致科监督等职。翻译有《富国策》(丁韪良校订,原著采用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书),于1880年出版。协助丁韪良翻译有《公法便览》等书。

刘树屏(1857—1917),字葆良,江苏武进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甲午战争后,提倡改革教育,改龙城书院为致用精舍。后调任安徽,集资创办皖南中学。旋任上海澄衷学堂校长,代理南洋公学监督。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后,刘出任公学总理。他根据盛宣怀的指示和自己办学的经验,公布了《整顿学堂条陈十则》,同时又改监院为斋务长,下设监学官、检查官,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下半年经盛宣怀保荐到津浦铁路南段任总办。1905年,在上海创办三星烟草厂(商办)。民国元年后刘隐居不出,曾参与编写《清史稿》,民国六年去世。

著作有《述铁路建筑时之弊》(抄本)、《毗陵刘氏宗谱》(十六卷)等。擅于楹对。

张美翊(1856—1924),字让三,浙江宁波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至光绪二十九年冬,光绪三十年夏至光绪三十年冬,曾两度担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

光绪三十(1904)年,他在担任四品衔直隶知县任内被盛宣怀任命为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悉心办学,聘请了数十名中外籍的教师,教育学生要学好科学知识,不要受其他思潮的影响。同年,南洋公学改属商部,根据商部尚书载振的要求,张美翊写成了“呈报公学历年办理情形”一文,并造就各项简明清册8本,呈报商部。报告阐明了办好学校的方针和措施。

著有(1)《上虞永丰乡田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民国四年(1915),凤堂木活字本;(2)《甬上屠氏宗谱》(三十六卷首二卷末二卷),民国八年(1919),既勤堂木活字本;(3)《陈节母江太君诔家传表述》,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4)《张蹇叟先生文稿》一卷;(5)《奉化县志》六卷。

张鹤龄(1867—1908),字长孺,又字筱圃,江苏武进人,近代教育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张鹤龄任南洋公学总理。次年二月,日俄战争爆发,张鹤龄就此事与张美翊、已离开南洋公学到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张元济及赵凤昌、吕景瑞等人紧急磋商:“诚恐以后各国大会媾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议定由张美翊收

集巴黎及柏林和会资料,呈送盛宣怀,并拟请盛约瑞方、吕海寰电告清廷,奏请实行。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张辞职,前后约半年。

张鹤龄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做过京师大学堂教习、京师优级师范科副总教习,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制订了学堂章程,以后道员分发湖南,历任粮储道、按察使,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奉天提学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1908年卒于任所,年仅42岁。

张鹤龄治学务实,博览群书,潜心研究欧美译著,熟悉中外政治历史,提倡变法维新,与辛亥革命领导人宋教仁、黄兴等素有交往。提出中国文字繁难,必须进行文字改革。著有《变法经纬公例论》等。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泗县)人。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商部接收了南洋公学,校名改为高等实业学堂,杨士琦任监督。杨士琦上任后对学校教务、体制等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总理、提调职务,设教务、斋务、庶务三长分工负责学校行政,重新制定《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章程》,明确提出“本学堂讲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为振兴中国商业造就人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3)八月杨士琦辞职离校。

曾任农工商部侍郎、邮使大臣等职。

王清穆(1860—1941),字希林,号丹揆、农隐老人,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与唐文治共事清廷,过从至密。

光绪三十年(1904)南洋公学改隶商部,商部委派王清穆在沪先行接收。次年春王清穆代表商部到校宣布杨士琦为监督,改校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同年秋杨士琦调京工作,监督一职由王清穆代理。

王清穆早年任职户部,后历任湖北按察使、南洋宣慰使、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浙江财政清理官、江苏财政司司长、太湖水利局督办等职。1913年前投资大生纱厂一、二两厂,后又投资大通、富安两纱厂。曾任大同商业银行董事长。

王清穆非常关心交通运输事业。光绪三十年,他以商部参议身份奏陈朝廷:“植商业之基础,莫如内河航政一事。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铁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铁路之动需千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请饬各省有航路处所,于华商轮船公司亟予保护。未设者,提倡筹办。”报可。自是小轮公司渐推渐广,闽、粤滨海之区,轮樯如织。(见《清史稿》)

光绪三十二(1906)年,王清穆曾“规画江苏全路,江南自上海经松江以达浙

江,北自海州入徐以达豫”。(见《清史稿》)民国三十年(1904)农历五月因病去世。

杨文骏(生卒年不详),字颐卿。1907年春杨士琦(杏城)监督辞职,邮传部派杨文骏任南洋公学监督,同年八月杨文骏辞去监督一职。

同治期间,杨文骏任香山县知县,在《查核澳门新旧租界时形节略》的奏折中,揭露了葡萄牙人对澳门的蚕食情况。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中国人开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杨文骏是银行总董之一。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教育家、文学家。唐文治任交大校长14年。在交大期间,创设铁路、电机、航海、铁路管理、土木等专科,以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业人才。辛亥革命后改学校为工科大学,即由原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南洋大学堂。经唐文治倾心办理,到民国元年,学校已蜚声国内,凡有志于工程技术的青年学生,莫不远道慕名而至。学校50周年校庆时,校友和师生募捐修建大礼堂,命名为“文治堂”,以资纪念。

唐文治光绪十八年(1892)春考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甲午战争后,他向清廷呈《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针砭时弊,抨击权奸,吁请严惩战败将领。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他亦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支持康有为的爱国行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他宣布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体恤商艰”为主,规定商部官吏不得自营商业,以图私利,严禁贪污纳贿。手订商律131条。这是中国有商法的开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不久,因母丧回原籍。从此脱离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唐文治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校内发动捐助军饷,支援沪上起义军,并与伍廷芳等一起联合通电,要求清帝宣统逊位。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镇压大批爱国学生,他曾连发三份电报给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院,要求保护、释放北京的被捕学生。

1920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无锡前西溪寓所休养。是年夏,应学生高阳之请,担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年底,又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馆长。1935年12月,为庆贺唐文治70寿辰,交大校友和国专同学集资在无锡五里湖畔宝界山边建筑了“茹经先生纪念堂”。

解放后,无锡国专改名为中国文学院,仍由唐文治任院长。1954年4月9日,